

# 阐释学翻译观与视界融合

——以《南非之父:纳尔逊·曼德拉》的翻译为例

刘小林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阐释学翻译观是国内外译界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在国内也经历了数十年的译介和传承。在梳理阐释学翻译观起源及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阐释学翻译观的视界融合及主体间性理论,结合翻译实践,对阐释学翻译观的理论内核进行了论证,从而揭示了阐释学翻译观作为翻译理论研究史上开拓性成就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阐释学翻译观; 视界融合; 主体间性; 《南非之父:纳尔逊·曼德拉》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 引言

阐释学有多个别名,如:“解释学”,“传释学”,“释义学”,“诠释学”,等等。阐释学译自英文单词 Hermeneutics,该词起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信使之神赫尔墨斯(Hermes),此君的任务是精确理解诸神尤其是宙斯的旨意,将它传达给世人,并负责解释其含义,“对神谕加以解释而使其变得意义明晰”<sup>[1]</sup>。自诞生以来,阐释学翻译观的本质和内涵经历了诸多的演变,也发展出了众多的理论分支。但总体而言,阐释学翻译观的本质是理解和解释,“理解”和“解释”构成了阐释学翻译理论的基本范畴。阐释学翻译观在国内译介的历史并不长,其接受效果也有待检验和论证。

## 一、阐释学翻译观的前世今生

从内涵和本质的角度出发,阐释学大体上可划分为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古希腊的阐释学是为传统阐释学起源。到了中世纪,阐释学则以“释义学”、“文献学”等面貌示人。翻译学家们以阐释学理

论为基础,提出了阐释学翻译理论。到了18世纪,出现了两位阐释学翻译理论家:德国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Dilthey)。总体而言,传统阐释学理论认为阐释即理解和解释,译者应该尽量理解和把握源文本的原意,应进入到原作者创造该文本时的意境,把握原作者的本意。传统的阐释学翻译理论无疑秉承了一种客观主义精神,而这种客观主义精神与传统翻译价值观是一致的,后者便把“忠实”、“等值”等奉为衡量翻译的首要标准。

而在现代,阐释学翻译理论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向,以海德格尔(Heidegger)和伽达默尔(Gadamer)为代表的一干理论家们提出了与传统阐释学理论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文本依然是翻译活动的中心,并构成了阐释的基础。翻译(包括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的活动,故阐释是翻译活动的基本特征。对源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是具有开放性的,从而具有了多样性,对源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开放性的无限的循环过程,不断生成新的理解和阐释,也就不断生成新的目的语翻译作品。译者是源文本的首批

收稿日期: 2013-12-23

基金项目: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C13YY02);浙江省教育厅项目(Y2013287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WWW001)

作者简介: 刘小林(1974-),男,安徽黄山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研究、跨文化交际等研究。

阅读者和欣赏者,译者不同,阅读和欣赏的结果不同,这增加了翻译活动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如此的翻译活动和翻译过程必定会产生千差万别的目的语文本,这些文本都必然会“忠实”或“等值”于源文本?它们都会完美再现源文本呈现给源语作者的阅读效果?因此,他们认为,阐释作品根本不必“忠实”、“等值”于源文本,不必进入原作者创作源文本时的世界,不必寻求与原作者的认同,而应重点关注对源文本本身的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阐释学翻译理论再次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向,其代表人物有美国阐释学理论家赫施(E. D. Hirsh)等。在赫施看来,只有源文本作者才能决定源文本的意义,源文本不可能离开原作者而单独存在<sup>[2]</sup>。译者如果要充分理解和阐释源文本,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取得和原作者的思想或精神交流。原作者再次在翻译活动中变得举足轻重。

20世纪70年代,斯坦纳(Steiner)发表了鸿篇巨著《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 1975/1992),这是阐释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此著作在秉承施莱尔马赫理论思想的同时,开拓性地论证了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它将翻译的过程直接定义为译者和作者之间相互理解和阐释的过程,该过程由四个步骤构成,即“信任”(trust),“侵占”(aggression),“汲取”(incorporation)和“补偿”(restitution)。在第一个阶段,译者以某种方式接受了翻译委托,相信源文本是有意义的,是可阐释并加以传递的。但是,当译者遇到源文本中的一些不可阐释或不可传递的部分时,便不再信任源文本,此时第二阶段“侵占”粉墨登场了。为了理解源文本的意义,译者面对着不同语言、历史、文化等因素造成的重重困难,要攻克、解决这些困难险阻,其手段可能具有些许蛮横无理的特征,目的就是剥离源文本的外壳,获取其思想的内在。完成了“侵占”,下一步便是“汲取”了。汲取阶段是阐释的关键所在,译者通过源文本的外在形式理解、吸纳和阐释思想的内核。此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意义的归化,源文本的信息也因为被异化而被改造、变形。此时,补偿阶段就尤为关键,译者通过补偿来传承源文本的优点和精华,使译本重新达到一种平衡,从而成功地完成了理解和阐释。<sup>[3]</sup>

解释学翻译理论在中国译介的历史并不长。1987年,袁锦翔发表论文《一种新的翻译文体——阐释》<sup>[4]</sup>,是国内解释学翻译理论译介的开端。他以解释学的角度分析比较了不同的译文,指出了译者

对原文理解的重要性。杨武能发表了论文《阐释、接受与再创造性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sup>[5]</sup>,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视角探讨了“文学翻译家既是阐释者又是接受者”这一理念,阐释了“译者→作者和读者→译者→作者的阐释、接受和再创造的循环的文学翻译过程”这一翻译思想。谢天振在《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另辟一章专门讨论了“阐释学派翻译理论”,并指出“翻译与阐释学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理解的进行方式就是解释,翻译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周旋,因此可以看作阐释学最有代表性的范例。”<sup>[6]</sup>这些都标志着阐释学翻译理论正式被译介进入中国。

## 二、阐释学翻译观之于视界融合与主体间性

阐释学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维度,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作者和作者的本意,而是更加关注文本的本意,更加关注译者的理解与读者的接受。与传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相比较,阐释学翻译观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它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彰显了读者和作为首批读者的译者的地位。译者、读者和作者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在刘小林<sup>[7]</sup>看来,这正是世界翻译理论发展轨迹的实质和内涵所在,即翻译活动的中心和重点从源文本(原作者)到理解和阐释(译者)再到目的语文本(读者)的依次转移。

理解的主体(人)与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源文本本身处在一个异于译者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不同译者也具有不同的主观因素,即使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具有不同的心态、认知和表达风格,这些都给阐释性翻译活动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和维度,翻译便具有了广阔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理解不再是消极的复制,而是创造性的劳动。这些在传统译论看来都是新颖的,又是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阐释学翻译观给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活动提供了崭新的视阈,极大地推进了多元性、开放性的翻译和阐释。在传统译论看来,译者需要处理作者本意和文本本意、“熟悉世界”和“陌生世界”的关系,需要将自己当作源文本作者,离开自己的熟悉的世界,进入到源文本作者的那个陌生的世界,与原作者直接对话,理解作者的本意,这样才能产出理想的翻译效果,令原作者能够和译文读者直接对话。而在阐释学译论看来,翻译活动应该服从作者本意还是文本本意?如何处理“陌生世界”和“熟悉世界”的关系?

如何处理翻译和“前理解”、译者主体性、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既然文本、作者、译者都是历史地存在着,翻译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这些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了阐述这些相对概念的关系,阐释学译论家们引入了“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的理念。

阐释学家伽达默尔<sup>[8]</sup>指出,不同的译者和读者接受时会带着自己所处的不同时代精神,他们关心的不同的时代问题,不同时代的“偏见”和“热情”,使得不同历史时代的接受者对某一作品的理解和感受是不同的,他们运用新的眼光,带着新的问题去履行接受、评价、创造等活动。这正是所谓的在历史中永不消逝的“现代视野”;正是纷繁复杂的“现代视野”,令艺术接受中的创造和评价能在无限的历史过程中展开。“理解是我们卷入其中却不能支配它的事件;它是一件落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世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解释学的理解既包含了我们突然遭遇的陌生的世界,又包含了我们所拥有的那个熟悉的世界”。伽达默尔<sup>[8]</sup>还清楚地阐释了关于“使两个视界融合”的观点,他认为:传统解释学理论强调翻译的客观性,没能看到理解与阐释的历史性。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作为理解主体的人和客体的文本都是存在于某一历史空间和维度,而历史的演变发展是永恒的。因此,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作为阐释客体的文本和主体的人都有着自己的“视界”。阐释便是将不同的“视界”加以“融合”。所谓视界融合,便是指译者带着自己“熟悉世界”进入到源文本的“陌生世界”,随着理解和阐释的推进,此两个世界不再那么泾渭分明,渐渐地,两个世界的界限变得模糊,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融合。译者越来越认同作者的历史、文化、心理语境,也必定会将更好的阐释作品呈现给读者。

此时,讨论阐释学翻译观的主体间性理论(inter-subjectivity)就尤为必要了。传统译论关注的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性,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是当代翻译研究发展的趋势。所谓主体间性理论,其目的就是力图去除传统翻译研究的主体中心论,去除将主客体加以泾渭分明地划分的思维模式,从而展现作者与译者和读者、源文本与译本、文本与人之间的相互促成、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交互关系。因此,世界译论发展经历了作者到译者再到读者的主体中心转移,作者不再主宰一切,译者甚至读者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主观能动性,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阐释过程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变成了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主体对话。但是,强调译者甚至读者的重要性和创造性,也应该以不否定作者和源文本为前提。这种认为源文本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及读者同等重要的观点,正是所谓的主体间性理论。阐释学翻译观的视界融合和主体间性理论无疑为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提供了巨大的参考和指导价值。

### 三、阐释学翻译观之于翻译实践

曼德拉是当代最知名的非洲黑人之一。被种族隔离政府监禁27年并获释,并成为“彩虹之国”——南非的总统,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堪称现代传奇。同样令人难忘的是,他化解了一场在众多评论家们看来极其棘手的殊死的社会冲突。2012年,受华夏出版社的赞助,作者有幸将曼德拉的传记 *Nelson Mandela: A Biography* 翻译成汉语,出版面世,并以此向这位新近辞世的伟人致敬。翻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荆棘,作者收获了颇多感悟,经历了思想的洗涤和升华。基于阐释学翻译观的指导思想,作者对翻译的内涵和本质、视界融合理论、主体间性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到底什么是翻译?翻译的实质是什么?就作者自身的翻译实践而言,要翻译这本传记,就必须要了解曼德拉这位伟人,要了解曼德拉,就必须要了解他的生活和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了解他的文化背景,了解他的亲人、朋友和学校对他的影响,了解南非白人殖民社会的政治势力及其滋生的种族隔离制度,了解他过去的同事以及他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总之,要很好地阐释这本传记,首先就必须对其一生的功绩有着全面的认识和评价,深入地了解他的性格特征、长处和弱点,以及他所处时代的国内和国际政治背景。

有了这些认知前提,然后就是对文本进行理解和阐释了。斯坦纳的阐释性翻译四个阶段(信任,侵占,汲取和补偿)理论在此得到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和实践。首先,译者对曼德拉这位伟人有着一无限的景仰,对传记的英文版有着完全的信任,相信它是有着理论和现实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对翻译活动充满了热情与动力。随着阐释活动的深入和推进,译者发现曼德拉身处一个完全异于译者自身的世界,历史、文化、心理等等因素造成了重重阻碍,遍地荆棘,这些给理解和阐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译者转而采取侵占的策略,以略显“暴力”的手段处理源文

本中的与译者自身迥异的文化、历史、心理等元素。剥开了形式的外壳,露出了内在的内容和思想。这时候便是汲取的阶段了。译者徜徉在曼德拉的心灵世界,通过文字追随曼德拉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加以理解并阐释,并以目的语的外在形式加以转换。此时的目的语文本仍是残缺的、支离破碎的,需要补充和完善,以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并呈现给读者,这就是所谓的补偿阶段了。所以,翻译并不是简单地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而是理解和阐释。

#### (一)翻译实践之于视界融合

在翻译这本传记的过程中,至少存在着三个视界:源文本作者的、译者的和潜在读者的世界。译者首先要带着自己的世界和一些瓶瓶罐罐进入到作者的世界。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是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非洲大陆,非洲黑人完全生活在白人的压迫之下。如何理解并阐释这个陌生的世界,这需要融合译者,扔掉一些瓶瓶罐罐,在两个世界之间寻找平衡和妥协。同时,这种平衡和妥协要有一定的限度,因为译者还需要照顾到读者的世界。读者的世界与译者的世界比较,有共性也有个性。翻译这本传记的过程,在一定程度而言,就是调和以及融合作者、译者和读者的视界的过程。例如:

1934年,16岁的曼德拉经历了滕布部落的成年仪式,以证明他具备了成人的胆量。割礼仪式在庄严地滕布部落王室的启蒙场举行,它位于姆巴舍河边的提亚拉哈,这种仪式禁止妇女参加。现在这种仪式仍以不同形式举行。仪式包括往受割礼者身上涂抹白色黏土,穿上用天然纤维制成的特殊服装,包皮是在不施麻醉的情况下用长矛切除的。曼德拉仍记得疼痛让他稍稍过了一段时间才喊出割礼后以证明他成年的那句话:“我成人了!”<sup>[9]</sup>

上述场景的描写充满了浓厚的异域风情,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迥异于译者和读者的世界。想要生动再现这样的场景,需要译者抛弃部分自己熟悉的民族历史、文化元素,探索作者的世界,并从汉语读者的思维方式和角度出发,以书面的方式理解和阐释上述文字,糅合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的视界。

#### (二)翻译实践之于翻译活动的主体间性

此次翻译实践至少涉及了美国作者彼得·利姆(Peter Lime)、译者和汉语读者三个主体,或许还应该包括伟人曼德拉,如何处理主体间关系是译文是否成功的关键之一。译者不再循规蹈矩于传统的译

论,源文本与作者不再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准则。译者秉承着阐释学翻译观的精神,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对源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造和改写,以满足读者阅读的需要。但是,这种改造和改写是有限度的,不能肆意妄为,不能与源文本南辕北辙。在此,译者赋予了作者、译者和读者以同等的重要性,这样才能恢复和创造翻译活动中的平衡与和谐。

### 四、结 语

阐释学翻译观,尤其是当代阐释学翻译观,彻底颠覆了传统译论关于翻译实质和翻译过程的思想,其视界融合和主体间关系理念尤其值得推崇和传承。译者和读者从此不再低声下气,摇身一变和作者平起平坐了,能够和作者公平对话了。源文本不再是统治一切的标准,译本拥有了巨大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阐释学翻译观在不同时期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观点和倾向。传统阐释学翻译理论基本上赞同传统译论的观点,认为翻译活动应该以源文本为准绳,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译者并没有较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译者和读者仍应该服从于作者,译文仍然从属于源文本。在很多情况下,因为历史、文化等语境的巨大差异,会导致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现代阐释学翻译理论则另辟蹊径,一举颠覆了传统译论的主体思想,突破了“忠实”、“等值”、“信达雅”等理论的桎梏,认为作者、译者、读者应该平等对话,认为译本不必完全以源文本为信条,译者拥有了创造性,译本拥有了多样性和开放性,这造就了缤纷多彩的翻译世界,并引导翻译理论向着可译性(translatability)的方向发展。同时,还应该关注读者的反馈和认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多样性和开放性应该以不完全忽视源文本为前提,需要把握一个理性而合理的度。

视界融合理论和主体间关系理论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了“视界融合”理论。从本质而言,该理论就是要求将作者的本意、源文本的意义、译文和读者的接受和谐统一起来,将翻译活动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统一起来,从而造就一个令人满意的、有意义的翻译行为。要造就一个有意义的翻译行为,就必须兼顾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主体间关系,令三者能够公平对话。阐释学翻译观无疑是翻译理论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成就,翻译研究和实践从此进入了新的

时代。

#### 参考文献:

- [1] 王岳川. 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169.
- [2] 赫·施. 解释的有效性[M]. 王才勇,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91: 269.
- [3]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2nd ed.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1992.
- [4] 袁锦翔. 一种新的文体: 阐释[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7(3): 56—59.
- [5] 杨武能. 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 文学翻译断想[J]. 中国翻译, 1987(6): 3—6.
- [6] 谢天振.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101—103.
- [7] 刘小林. 读者登场: 翻译研究的轨迹和内涵[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2011(6): 921—925.
- [8]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7.
- [9] 彼得·利姆. 南非之父: 纳尔逊·曼德拉传[M]. 蒋伟民, 刘小林,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2: 9.

##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and Fusion of Horizons ——Take the Translation of *Father of South Africa : Nelson Mandela* for Example

LIU Xiao-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one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domestic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circle in recent years, has experienced decades of translation and inherit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sion of horizons and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 in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organiz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demonstrates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based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reveals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as an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Key words:**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fusion of horizons; intersubjectivity; *Father of South Africa : Nelson Mandela*

(责任编辑: 张祖尧)